

都是浇灌少年武田心灵成长的有机部分，也为其未来的人生涂抹了最初的生活底色。青年时代就读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武田泰淳，乐于交往并频繁接触在日中国留学生与进步文人，其也曾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度热衷于日本彼时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反帝反战运动；因此，武田泰淳曾数次被东京警察当局逮捕入狱，无端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政治机器之凌辱与迫害。武田泰淳是一位与中国有着深厚因缘关系的日本文艺青年，他崇尚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学、向往中国大地；然而，作为佛教僧人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核心成员被裹挟入侵华战争之洪流，无疑注定了其多舛的人生命运。可以说，从1937年9月至1939年10月作为侵华日军辎重兵的华中战场从军生涯，再到1944年4月至日本战败的上海文化殖民机构生活体验，并非这位日本“少壮派”“中国派”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观选择。在热爱中国、向往中国与侵华战争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便是青年武田的基本生活实态；而且，从日本文学中侵华战争与中国因缘这一话题出发，“战后派”文学家恐怕无人可出武田泰淳其右；由是观之，他的反战意识和反体制精神势必有可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其文学世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秉持科学理性之态度，心怀善意宽容之期待，审慎地抛开粗略的小说家历史背景认知的成见，结合武田泰淳人生、文学中特定的中国渊源与中国元素，在文学上层层剥开其战争题材小说的思想内核，发现和阐释武田泰淳侵华战争反省意识的异色光泽，无疑是一项值得中国学人去探讨和发掘的课题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曾在战争期间就职于日本占领

军文化殖民机构的武田泰淳遂成为战败国的一位侨民，继续滞留在中国上海近半年左右的时间。直至1946年2月11日才搭乘日本“高砂丸”号，从上海港出发辗转返回自己的故乡东京。彼时的武田与大部分历经战争洗礼而残喘苟活，尚且惊魂未定的日本人一样，在东京见证了被美军空袭过后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的惨淡景象，作为文化人他不得不静下心来重新去思考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同年10月，一如既往反感佛教寺院家庭生活并急于挣脱眼前生活窘境的武田泰淳，有幸通过高中同窗、“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冈崎俊夫之引荐，得以公开发表自己战争期间的习作，一部名为《才子佳人》的中国题材浪漫爱情小说。

这部连载于杂志《人间》上的浪漫爱情故事，实际上是武田当时为躲避日本军事当局再次征召，于1944年6月逃往中国上海之前即已写就的消遣之作。因此，直到他第一部小说《才子佳人》的问世，武田泰淳并没有真正动过做一个名副其实小说家的念头。武田泰淳在自己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曾经说到：“即便如此，我也完全没有当作家的打算，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才子佳人》发表之后，大约过去半年的时间，我什么也没写出来。我也曾尝试继续写一些类似《才子佳人》那样唯美的小说，但最终还是感觉自己是那么丑陋，实在写不下去……那时，北原武夫频繁倡导文学者要去设定‘第二个我’的思想……”^[1]就中可知，在公开发表《才子佳人》之后，武田泰淳似乎敏锐地觉察到，如果自己再继续搜索枯肠去创作“唯美的小说”，既会在心理上感觉自己言不由衷，于情于理似乎也不切合自己人生体验之实际。因为唯美